

# 春风拂璋追怀饶师宗颐： 毋忘香港的根



邓 聪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

## 一、饶公亲老师学恩

在我心目中，饶公是我的亲老师（图一）。中国北方，亲老师是手把手教导的入室弟子对老师的尊称。我是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学生，可惜并没有选修及旁听过饶公的课。这只能以我年少无知为遁辞。20世纪70年代前后，中文大学人文学科教授星光熠熠，钱穆以后历史相关任教的有牟润孙、严耕望、全汉升、余英时、李田意、王德昭、陈荆和、张德昌、孙国栋、罗球庆、许冠三和王曾才等。考古学有郑德坤、林寿晋、杨建芳、王人聪。我是从大学三年级开始，从历史转向考古学的专攻。



图一 饶宗颐先生：一代宗师演讲的神情  
(2003年3月《诗与古史》谈凤玄鸟与商史关系)

饶宗颐先生是中文系的教授。饶公是我心目中的亲老师，这个亲字，包含了多重含义。第一，我出生在香港，与饶公都是香港人。1949年饶公来港后，在港生活69年之久，并没有早年不少北漂在港学者花果飘零，过客无根的心态。香港是吾家为我们共同的信念。

第二，饶公原籍粤东潮州，讲的母语应是我听不懂的潮州话。不知何时开始，饶公也通晓了广东白话。我们间喜得一直用港式的粤语交流。这种特别亲切乡音无间贴心感受，是难以形容的。

第三，1979年我的硕士论文《中国东北新石器文化研究》，林寿晋和饶公是校内审查的委员，校外是当时哈佛大学的余英时教授。结果是余先生给我硕论打了A级的评分。而饶公在论文审查会议上，说我所用的都是二手资料，批评得相当严厉。70年代要求一个港生，去中国东北做第一手田野调查工作，不免有点天方夜谭的感觉。且当时我在香港仅参加过一次本地考古发掘，对考古的理解十分浅薄。就在这样误打误撞的命运安排中，从研究生开始即注意东北亚考古的情况，看到鸟居龙藏、江上波夫、三上次男在红山后等地的工作。我在东京大学的博士论文，是东北亚旧石器时代晚期细石叶技术构造。直到今天，我仍然以东北亚史前作为研究的核心。后来听饶公说，他自己在西方学术界见闻，学者研究特别强调亲身下田野和亲手接触实物的重要性，所得往往比文献的记载更可靠。饶公对我硕士论文的批评，为我日后求学指示方向，一生谨记。

第四，饶公博学多才。我主观上觉得，饶公特别倾情于近代考古学的发现。饶公退休晚年间，我们的约会尤其难得，其中难关之一是会见必须通过饶公次女清芬女士的批准。清芬女士多次警告我与饶公的会谈，要自我有所抑制，谈考古新发现不能让老人家太兴奋，否则会伤身。饶公往往谈论考古新发现，不自觉间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饶公晚年倡导由于古典重温新义激起，预见我国未来导向文艺复兴的可能，又以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坚信“20世纪为中国学术史飞跃时

代”“开前古未有局面”。考古学上共同兴趣的缘分,也让我们亲上加亲。

第五,自1985年后多年间,我有幸得与饶公共事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近水楼台先得月,同研究所间有更多机会亲近饶公,执卷问学。我们共同对香港古代历史探索,有强烈的愿望。长期以来,香港被讥评为文化沙漠,饶公并不以为然!他十分喜欢香港的社会。

2010年我在拍摄《香江怀古》片集采访饶公。他直言香港文化最大问题就是:“大家看历史看得太短,短视,是历史的短视。”(图二)殖民地时代以来急功近利是社会普遍的现象,人们对于对自己地区历史了解,一般仅止步眼前的事物。他切望香港社会今后对自身过去历史更多的关注。因为古代文献对香港记载的缺乏,更突出考古对复原香港历史的重要性。我总结饶公对香港考古的重要贡献有三,将在下文分节论述。



图二 饶宗颐教授在《香江怀古》视频上讲话

第二、三节分述饶公对港地汉、宋考古之议。第四、五节则通过自己亲见亲闻事实,介绍饶公考察研究牙璋的过程,也简略综述近来相关研究发展;也正因为大湾商代牙璋的发现,勾起饶公回忆弱冠与顾颉刚编辑《古史辨》学术上的齟齬,又再一次旧事重提,引发饶公半世纪后对举足轻重的古史辨学派的评议,这是第六节内容。如此三节共同构成贡献之第三点——夏商牙璋探索与古史辨的突破。

## 二、李郑屋砖屋墓年代的考证

1955年李郑屋砖屋墓发现之初,主持发掘的香港大学的林仰山教授,来港前曾经在山东地区积累很丰富的考古经验。他从初期李郑屋墓发现的时候,就感觉到这可能是一处汉墓,由于他比较慎重的性格,所以没有轻易下一个定论(图三 香港历史博物馆,2005)。事实上,由于陶瓷器属性的变化迅速,考古出土的陶器,往往作为对遗址断代的指标。林仰山在

1955年8月13日报告中,指出李郑屋遗物“这些带釉陶器可能属于汉代,或六朝时期,形制像汉代,但也有可能属于六朝时期。”



图三 香港大学林仰山教授在李郑屋墓内整理文物

然而,曾任崇基学院历史系主任黄福銓教授受院长凌道扬教授的托付,在实地考察李郑屋墓后,撰写《李郑屋村古墓拟即南宋杨太后衣冠冢考》一文,于1955年9月2日先在《工商日报》刊登,后又在同年9月23日—10月1日《华侨日报》刊出。1981年该文更以单行本由中国书局刊行(图四)。黄教授基本思路认为:“唐以前九龙可能未有中原人留居。”据黄教授的观察,“当古墓在热烈地发掘的一周间……但时论认为是‘晋墓’这一点,我却抱很大的怀疑。”他认为饶教授解说“大治历”为“大吉利”有合理之处,但“大吉番禺”不能作为时代的标志。黄教授甚至想象,李郑屋古墓有一些文字砖,是从附近“由不同地区搜罗得来”,而墓碑上隶书是宋人“发思古幽情”而作,并不可作为判断年代的根据。

当然,以今日史学与考古进展考量,黄教授提出的唐以前中原文化与香港无关、李郑屋墓为宋代的两个假设,已成为学术史的材料。而黄教授指出李郑屋墓发现初期,香港社会一般认为是晋墓的意见,这反映由林仰山教授领导下,对李郑屋墓的断代,未能遽下定论。



图四 崇基学院黄福銓教授李郑屋墓的著作

饶公在汉墓发掘期间，曾与罗香林教授等一同进入李郑屋墓考察，当时一定是十分激动的（图五 香港历史博物馆，2005）。其后，罗香林教授以墓主人身份不可考，认为文献记载在汉代此处开始设盐场，有可能与此墓相关。饶公在1965年前后，曾在中国香港大会堂及日本大阪大学演讲，已指出李郑屋内砖印文字考证“大吉番禺”（图六A）及“大治历”含义，从拱门及左室造砖者的题名薛师的“师”（图六B《李郑屋汉墓》，2005）字，与恒帝永康元年的《修尧庙碑》和灵帝建宁五年的《成阳灵台碑》相同，勘合汉碑字体，认为是东汉墓的论断，一锤定音。



图五 香港大学罗香林和饶宗颐教授等在李郑屋墓内合照



图六 饶宗颐教授据 A“大吉番禺”及 B“薛师”勘合汉碑，将李郑屋墓断为东汉时期

林仰山在1955年曾说，依靠李郑屋墓内文字风格考证年代的可能，“若要靠字体更准确地断定其年代，我们必须把这些时期尚存的文字与是次发现的细心比较。”林仰山对中国考古的精通，在此反映一二。林对墓砖文字断代考证的设想，由饶公旁征博引以“字体断代”，最终“得到大家的认可”（饶公语）。林、饶之间是伯乐与千里马关系，学术上同气相求，为李郑屋墓研究

树立一良好学术的典范。近年来广州、佛山、南海、深圳、珠海、徐闻等地，发现了众多东汉墓葬。正如社科院考古所白云翔先生总结，“李郑屋汉墓与广州及珠三角同期墓葬形制结构及随葬品，都有着相当广泛的一致性。”饶公首次解决李郑屋墓东汉的时代问题，意义重大。李郑屋墓明确了汉政权在香港的直接管治，并且香港是隶属南海郡番禺县的重大问题。

我在2014年发表的《秦汉香港及李郑屋东汉官吏墓论述》<sup>①</sup>中指出，自汉初南越国制度的传承显示，文物上铭刻“番禺”两字，便往往与官吏政治的关系密切，是一种官方使用、管理行为的内在证明，已是相当清楚的事实。东汉政权在珠江口侧开发的重大历史意义，可以看作此地区逐渐变为汉化中心发展，九龙半岛是珠三角汉化的前沿地。自汉以来香港新界西侧繁荣远超过东侧，即溯源于东汉时期的汉化推动。这样的格局一直到十九世纪西方船坚炮利来香港后，才有所改变。

饶公在2005年李郑屋发现五十周年纪念刊上，赐墨宝《李郑屋汉墓》题字（图七 香港历史博物馆，2005），发表了《由砖文谈东汉三国的“番禺”》<sup>②</sup>，综合文献及考古最新发现的成果，指出“建安中，番禺因士燮且一度成为交州治所。九龙东汉墓时属于番禺，正值南中，处安谧繁荣状态，当时人文景观，有极高度文化，可想而知。”观察香港博物馆所刊出1924年九龙半岛航空图，李郑屋周围，仍保存有一定自然风貌。而到1954年航空照片所见，九龙湾沿岸一带已被开发至面目全非。1928年韩雷（C.M.Heaney）发表《香港石器》一文，当时九龙湾沿岸是已发现史前遗址最密集的区域，九龙湾是早期香港考古潜力最大的范围（图八 1928年）。但很快此后数十年间随着九龙半岛发展，考古遗址几乎是荡然无存。



图七 饶宗颐教授为李郑屋墓发现五十周年纪念题字



图八 1928年九龙湾史前考古文物的发现地点

现今大家一直说李郑屋是“唯一的一座汉砖室墓”，此中背后历史真相，可能是由于九龙半岛从未开展过科学考古调查相关。饶公说九龙半岛在李郑屋墓主人当时，曾一度“安谧繁荣”，是据文献的推测。九龙半岛原有汉代的遗迹，不幸已随风消逝！过去有人强调李郑屋汉墓的“唯一”性，只说明此墓是劫后余生的历史。今天李郑屋汉墓当然值得我们更加珍重，然而自该墓重出天日后五十载，我们迄今仍欠缺对之深入研究。

### 三、宋官富场及咸淳严益璋摩崖石刻考证

饶公对香港最早纪年南宋咸淳十年（1274年）严益彰石刻考证及宋末二帝海上行朝在东南沿海至香港史迹钩沈辨别，反映在他的名著《九龙与宋季史料》<sup>⑧</sup>内，分析宋末帝国与九龙历史关系的研究。其中1955年严益彰石刻的发现与考古关系密切，引起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港学者对香港宋代文献与考古资料探索一度出现过短暂的热潮。其中关键人物简又文及饶公为重要的代表。

简氏《宋官富行官考》、《九龙南宋石刻考》等文章，针对北佛堂南宋咸淳石刻初步的解读，贡献良多。简氏《三游北佛堂访古记》记载1958年1月18日，中外政要及文化人士共三十四人曾同游北佛堂细节，可见林仰山教授与饶公同行，此行集体照片饶公为站立第二行列左而右第四人，林站前列右而第三人（图九《宋皇台纪念集》）。饶公后有《南佛堂门古迹记》，自述1959年1月18日、9月23日、10月11日三游南北佛堂的细节。《九龙与宋季史料》书末附图七有林仰山、简又文三人在严益彰石刻前纪念照，弥足珍贵（图一〇《九龙与宋季史料》）。

饶公1965年《九龙与宋季史料》一经出版，即成香港古代史不朽的名著。此时书序简又文称赞饶公史才、史学、史识及史德，四美具备。简氏指“本书所搜集之史料中，有几种是难得罕见而由饶子发掘出来公之于众者”。

又书跋由香港大学中文学院罗香林教授评述，对饶公“于宋季帝昞、帝昺等所驻（石冈）洲地址问题，勾稽至富，厥功伟矣。……于其新着之精深博大，无所掩也。”这可见学界对饶公的折服。饶公中对南宋以前官富场地理沿革系分析，是理解咸淳严益彰石刻重要关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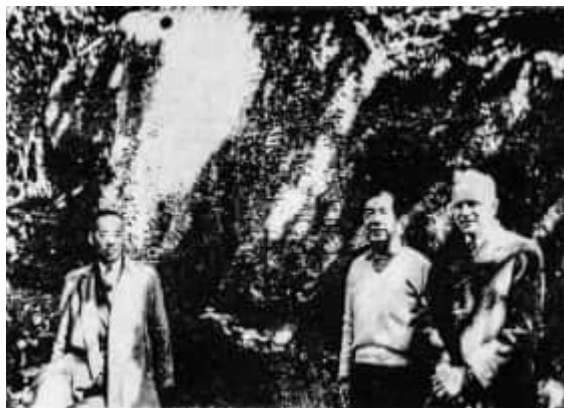
饶公在1997回顾半世纪香港考古，特别强调官富场历史的重要性。他从《宋会要辑稿》中披沙沥金，重塑出官富场历史的源流。“隆兴二年（1164年）提举广东茶盐司言及“官富场”之名且云：“官富场拨附叠福场。”今大鹏城附近犹保存有叠福地名。官富场即九龙地，宋端宗景炎元年（1276年）南来，十二月在甲子门，翌年四月次官富场。（见《填海录》）稍前这时候，本港考古发现度宗十年（1274年）咸淳甲戌，“古汴严益彰充任官富场盐官时，倡建之天妃大庙宇北佛堂门。今尚有摩崖石刻，斑斑可考”。

饶公钩沈宋史料中九龙与宋王朝末年的历史。严益彰石刻立石，仅早于端宗赵昞到达官富场两年前多一些，情理上严益彰是最有可能曾在官富场接待端宗的官员。今年四月，我曾专程前往大庙湾考察严益彰石刻，目前仍在室外自然生态下保存良好。遥想当年林、简及饶公三位先生在石刻前留影，已经是63前的历史，睹物思人，能不慨然（图一一）。

严益彰石刻发现当年，曾引起香港文化界及政府官员的注意，但学术上主要是简又文和饶公往来的切磋讨论。现今游人前往参拜石刻旁的佛堂门天后古庙为多。而在九龙城宋王台石刻占地利位置，又有宋端宗赵昺曾登临的传说，在民间及政府更受到普遍的重视。这两者均为摩崖石刻，而学术上价值的差别，显而易见。众所皆知，宋王台石刻制作的年代，可能比较晚近（图一二）。而具有宋末纪年日月及人物、地点、叙事石刻，以当时官富场“特首”身份严益彰所立本地妈祖庙历史发展叙事的石刻，反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严益彰石刻重新发现是1955年，24年



图九 1958年政府与文化界考察严益彰咸淳摩崖石刻，在天后庙前合照。（一排右而左第三人林仰山教授、二排左而右第四人饶宗颐先生）



图一〇 1958年饶宗颐、简又文及林仰山（左而右）三位教授在严益彰咸淳摩崖石刻合照



图一— 2022年笔者在严益彰咸淳摩崖石刻留影

后即1979年才被政府列为法定古迹，充分反映政府方面价值的取向。

现在，代表官方古物古迹办事处将此石刻正式命名为大庙湾石刻，或称地堂咀石刻，取意石刻地点位于西贡的大庙湾地堂咀。1965年饶公在此石刻照片说明是“北佛堂门咸淳摩崖”。简又文称之为“九龙南宋石刻”。以上三者命名检讨，古迹办大庙湾命名只提示一个海湾背景地名，并无时代及内涵的意义。简氏的命名过于笼统不明确。三者中以饶公的命名贴切，包括古地名、宋年号及石刻的载体。不过，现时国内对此等石刻统称“摩崖石刻”，而石刻题字者名字，均冠于命名中。据此可作：“严益彰北佛堂门咸淳摩崖石刻”，简称“严益彰咸淳摩崖石刻”。

上述此摩崖石刻自发现后，经饶公、简又文一时的研究热潮，20世纪60年代后迄今后继无人，半个世纪以上备受香港社会及学术界的冷落，在国内更几乎是寂寂无闻！而此石刻中“官是场”（图一三）目前是可以与《宋会要》文献记载互相印证唯一实物，关乎南宋九龙历史最重的文字资料，制作年代与宋末赵昀来九龙时间几乎是重合，为探索宋末海上行朝史料具



图一三 严益彰咸淳摩崖石上“官是场”石刻字



图一二 2022年“宋王台”摩崖石刻

重要的学术价值，不言而喻。虽然简又文对此石刻内容，尝试过细致分析，但其中石刻众多人物如与严益彰同游何天行等人的身份，正史中都缺乏记载。最近我们山东大学师生以计算机广泛搜索同时代闽粤家谱中，新发现此石刻内一些人物的背景，正在分析过程中。另迄今未见过对严益璋石刻遗址周围作试掘调查，且此摩崖石刻的母体加工考察、刻字技术及全体精确三维测量纪录，尚未有进行。

近年香港地区南宋遗址发掘数量也有不少。2012—2014年间，九龙湾沙中线圣山遗址发掘规模，达到23500平方米，初步统计出文物15000千克，30多万片陶瓷器。后者陶瓷器不是个体数目而是陶片数，其具体的意义是难以理解。其中报告书结论指出，沙圣山遗址出土宋元时期陶瓷窑口日常生活用器，福建占出土陶瓷70%（图一四），可见闽粤东南沿海陶瓷从海路进入九龙湾市场的兴旺。同时让人马上联想严益璋咸淳摩崖石刻的林道义，从先祖以来一直就是从事闽粤至官富场（九龙）贸易的文化商人，石刻中众多人物大都与三山福州有密切关系。这方面最近圣山考古成果与上述石刻的时代及两地社会经济交流事实，互相吻合。



图一四 九龙城圣山遗址出大量来自宋代福建窑口陶瓷在宋王皇台车站展出

我推测严益璋摩崖石刻制作的技工,也可能是来自福建的石匠。目前香港地区南宋阶段摩崖石刻仅发现过一处,刻字技工当然不是土生土长的传统。过去简又文只能单独谈本地一处南宋石刻。现今闽粤唐宋以来摩崖石刻已公布十分丰富的资料。据福州市博物馆张春兰女士提供,福州乌山、鼓山都发现几处宋咸淳年间的摩崖石刻,如泉州九日山摩崖石刻是其中一例。南宋从闽粤至香港沿海摩崖石刻的对比研究,将会是很值得关注的课题。

以饶公《九龙与宋季史料》为基础,今后从闽粤以至环珠江口考古视野的探索,将继承20世纪50年代以来香港宋代历史考古的研究,又再启航向前推进。宋末二王海上行朝及严益璋官富场与九龙湾一带历史的研究,饶公是导夫先路的角色,举足轻重。这方面饶公《九龙与宋季史料》就不仅是对香港考古学的贡献,而是宋末元初历史转折里程碑的奠基之作。

以上汉砖室墓和宋代纪年石刻两者,都是在1955年发现的。饶公自1952年起,执教于香港大学中文系。他来港不到几年,就遇上香港汉宋两项重大考古发现,确实是适逢盛会,亦是天意使然。近数十年来闽粤及香港本地相关考古发现不断推陈出新。饶公上述的研究历久常新,为香港考古学研究经典的作品。

#### 四、南丫岛大湾牙璋缘份

我所见饶公晚年最少有四篇文章涉及大湾牙璋源流的问题,反映出他对牙璋不寻常的重视,其中牵涉夏商王权国家制度的形成,同时与东南亚早期国家文明出现关系密切。香港大湾牙璋出土,成为引发我们对各地牙璋系统研究的导火线,从大湾牙璋出土开始,一直延续至今,越演越烈。饶公更是最早大湾牙璋出土现场的考察者,也是最早把大湾牙璋的研究引向国际方向发展的推手。以下大湾牙璋发掘的一些背景,作为饶公研究牙璋的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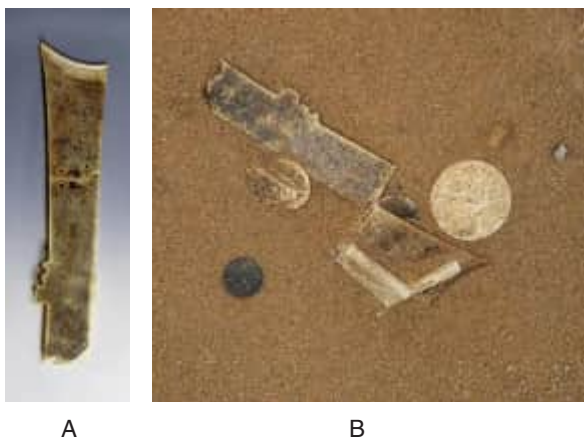
1985年我自日本留学回港,幸蒙郑德坤教授厚爱,回母校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工作。郑教授与北山堂利荣森先生(尊称利公)为燕京大学校友,交谊甚笃,郑教授曾向北山堂请求支持香港中文大学考古事业的发展。另利先生与饶宗颐教授过从甚密,利公长饶公两岁。就是在这样难得的学术背景下,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得以全力拓展港澳田野考古。1990年5月中山大学著名古文字学家商承祚函请利荣森先生,恳求支持广州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与我校合作,开展环珠江口地区考古工作。这建议很快得到北山堂主人的支持。1990年11、12月间,由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商志禛教授率领的小队,包括教授及年轻研究生共12人来港,共同发掘香港著名南丫岛大湾遗址。

大湾位于南丫岛西岸的东西走向沙堤上,遗址地貌东、西、北三面丘陵小山环抱,沙堤两侧有岬角,背后是泻湖。沙堤西侧有小溪流水注入海岸。我们按沙堤梯田地貌高低区分为I至IV区,用经纬仪统一规划沙堤发掘区的布方。田野发掘工作由1990年11月1日开始,至12月16日结束,共发掘面积315.75平方米。

大湾发掘的初期,我们集中在沙堤西侧沙丘高处I区工作,起初发掘的几处探方除一些破碎几何印纹硬陶片外,均空手而归。II区因为尚有农田田植,稍作试掘难以下手。III区所开探方在接近1米半的深处,出土新石器时代彩陶及白陶片。如此这般,11月大半个月的日子,都是在平淡以至失落的心境中渡过。到了11月末后期,我们决定把最后押注放在靠东侧小丘旁的第IV区。此时,对我们所剩下不多工作日来说,差不多已是山穷水尽的境地。事情转机一直要等待到12月3日,幸运之神才无声而至。当天下午约4时,在IV区H15探方范围内,以手铲在离地表深60厘米处小心翼翼水平刮削沙土过程中,一件璧形玉饰突起的一角,被手铲触及出现轻微破损,露出软玉质风化为白色的内部,真可说是崭露头角。

考古田野经验告诉我们,就算是坚韧如软玉的玉器,在出土初期也是柔弱如棉絮,必须细心处理。大湾的璧形饰冰山一角显露后,经细心审视及试探土色及包含物,似乎围绕璧形饰的附近,仍叠压着其他相关的遗物。观此,大家同时预感这可能是本次田野考古进入高潮的阶段,经过三十多天平淡无奇的工作,期待已久突破的转机,终于姗姗来迟,心情格外喜悦难以为外人道。当日因时近黄昏夕阳西下,理不应仓猝进行发掘。然而,贵重文物在野外原地无人看管,保安难以安心。经集体讨论,由于考古工地从没有外人进入,只要不动声色原地掩埋,估计是安全的处理。那天晚上,我们大家都十分期待明天奇迹的出现。大湾考古队的暂驻居地,在遗址东面小山岗一处荒废的石屋,四周没有邻居,多年无人居住的荒屋,不免四处野草丛生,也乐得一片清静。记得当晚我尤其兴奋,居处石屋屋顶失修,露出一个大洞,躺在床上仰观明月,清风随来,一夜难眠。回想起来,这些玉器在大湾渡过数千年的岁月,又何妨在沙丘上多躺一个晚上。

4日天刚亮,我们急不及待返回现场,托赖一切平安无事。此墓坑编号为M6,我们经过一天紧张的田野工作,才完成M6的田野发掘纪录。由我负责M6的墓坑范围辨别,及发掘过程的录像、拍摄工作。拍摄方面,我采用120及135的照相机,分别拍摄幻灯片及黑白的底片。摄影纪录墓葬、地层关系及玉器的原位置的写真。冯永驱用竹枝进行精细发掘,黄建秋及李果为墓葬实测绘图,M6发掘工作进行顺利。如果没



图一五 A.香港大湾商代M6牙璋串饰出土 B.牙璋

有细心反复按土色及包含物确认墓坑的范围，这一组玉器原位置出土背后隐藏的人类行为，将无以得知（图一五）。精细记录出土玉器的原位置，可以重组牙璋与串饰的组合方式。M6出土玉器以1:20大比例的实测图，对各器物精确位置关系、细节上的水平深度等信息进行纪录。M6墓坑为长方形，长2.02、宽0.9米，出土串饰和牙璋共19件玉器，集中于墓坑西南偏中。M6人骨无法确认，按串饰及牙璋位置推测，人头向西，玉石饰放置在墓主的胸前。此外，不能不附记一笔，在M6玉器全面揭露的一刻，考古队大部分的成员，均围观得兴高采烈，食瓜群众你一言我一语，其中有人大叫发现良渚玉器，也有人说是战国、秦汉的遗物，但最终没有人可以把“牙璋”辨认出来。最少我们可以理解，对一群来自岭南考古工作者而言，M6出土的玉器是颇新鲜未见过的器物。12月15日，这次大湾遗址田野发掘全部完成，共清理出十处先秦墓葬，出土丰富多彩的商代玉器。

12月5日大湾M6面世后，我立即向利荣森先生及饶宗颐教授汇报。同月7日，利荣森先生联同饶宗颐、王人聪及在港访问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伯达先生，一同来大湾考察。（图一六）他们对墓葬及各种出土遗物



图一六 1990年12月7日利荣森、饶宗颐等在大湾遗址考察

细致的考察。杨伯达先生是熟悉古代玉器的专家，指出大湾出土的是牙璋玉器，堪称港宝/国宝级文物。饶教授对是次考古的发现，同样表现得十分兴奋。12月5日是大湾牙璋订名之日，也是我们后来长达数十年牙璋追踪探索的起点。如果我没有亲身参与大湾牙璋发掘，可能此生与玉文化研究无缘。

## 五、牙璋国际性研究推演

1990年大湾牙璋的发现，迅即引起国内外广泛注意。在大湾牙璋研究早期阶段，饶公担当指导的角色，包括首次对中越牙璋对比、主持国际牙璋会议等。1991年间大湾牙璋出土消息，很快在国内外广泛流传。同年，中山大学大湾考古队员李果、李秀国在北京《文物天地》、我们在香港出版《香港考古之旅》<sup>④</sup>《环珠江口史前文物图录》<sup>⑤</sup>等书刊，逐步公布大湾牙璋发现的资料。又同年，东京大学考古系的吉开将人先生，把他刚从越南归来亲自调查冯原及XomRen遗址出土牙璋的概况，图文并茂来信详细介绍。这是我首次了解越南牙璋发现及其重要性的讯息。越南从1970年代已陆续有玉牙璋出土，一直未有公布。1992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李学勤先生在《南方文物》，发表大湾新出土牙璋年代问题的讨论<sup>⑥</sup>。我曾向饶公报告中国香港及越南方面牙璋研究动向。大湾牙璋出土后，发掘队成员中对其所属时代，一时意见分歧颇大，同时对牙璋来源问题整理，迫在眉睫。

1992年11月，饶公告诉我法国与越南即将恢复学术往来。他直接向法国远东学院院长汪德迈教授推荐，提携我在是年12月2—7日一周间，出席越南河内由越南社会科学院及法国远东学院合办的“越民族文化国际学术会议”，也是法国远东学院90年的院庆活动。12月2日河内大会欢迎晚宴上，我们得以认识越南考古学院何文璠院长。何院长通晓六七种外语，学识渊博，温文儒雅，为国际著名考古学者，东南亚考古学的权



图一七 1992年11月3日饶宗颐在越南河内演讲，何文璠院长传译

威。翌日，饶教授被邀大会第一个发言，以法语演讲中国内地及沿海牙璋分布及香港牙璋的新发现，何文璠院长即席为饶公传译为越语（图一七）。最后由笔者补充，用幻灯片介绍了大湾牙璋出土的状况。

此后几天除出席会议外，按大会安排参观河内还剑湖畔的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为法国殖民时期远东学院的路易斯·菲洛博物馆的原址。我与饶公一同参观了越南通史的展出。饶公尤其关注中越相关文物、碑刻文字等考察（图一八）。何文璠院长又邀请我们前往越南考古学院参观，由青铜时代研究室主任阮金容博士一同接待，展示冯原文化和海防市长睛遗址玉作坊出土玉器，其中一些玉戈、有领环、玦饰及青铜器等文物，让我们认识越南独立后数十年间考古突飞猛进的成就（图一九）。在河内会议几天生活期间，法、越及中各国学者间交流愉快，杯酒言欢。饶教授与越南文人学者即席赋诗唱和，谈笑风生。我曾笔抄录饶公即兴诗句如下：“新知旧雨四方来，揽辔名邦愜老怀，万里红河天共宝，千柯绿树晚仍佳，圭璋缟纈欣同讨，咫尺关河意自谐。此日暂游休惜别，他时相遇且衔杯。”越南红河三角洲是越南早期青铜冯原文化主要的分布范围，圭璋是专指玉戈和牙璋的玉器。最后的两句含义清晰，双方今后合作研究的可待。可惜这次在越时间短促，未及前往红河三角洲富寿省参观越南雄王博物馆，得一见越南出土牙璋展示。饶公在河内的盛意拳拳，引发何文璠院长积极回响。何院长欣然即席接受我们的邀请，日后来香港中文大学进行交流。这次第一回河内港越文化交流圆满结束，开启港越今后考古合作发掘的可能。

先生建议以香港考古的新发现，召开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大湾考古出土牙璋和彩陶为研究讨论核心。我们从香港以至华南的角度考虑，命名为“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会议”，以庆祝郑德坤教授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周年，并准备作为今后持续的考古活动。大

湾遗址合作发掘者商志禛先生和我筹办是次会议，饶公为大会顾问。商教授出身书香仕宦世家，家族有“四世书香两进士”美誉，其父商承祚是著名古文字学家。由于商教授在北京文博界人脉广阔，很快就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支持，著名考古学者安志敏、任式楠、郑光、张长寿、杨泓，被邀南下坐镇香江会议（图二〇）。更幸运是国内各省市文博、大专院校，曾考古发掘出土牙璋相关的学者，纷纷响应，均为会议的座上客。台北故宫博物院著名玉器研究专家邓淑章女士，多年来一直游走欧美博物馆，对流散国外收藏牙璋作综合报告。同年9月，日本京都大学林已奈夫先生也积极地参与，亲自莅临香港中文大学，观察和实测大湾牙璋等出土玉器，准备为香港牙璋国际会议撰写论文。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林先生对古玉钺及牙璋的研究，公认已取得突破性的成果。越南何文璠院长及樊梨香研究员的参与很受注目，他们分别就越南牙璋及彩陶最新的考古发现做了报告。来自胡志明市曾在北京大学留学的黎春焰教授，介绍南部越南青铜文化考古成果。美国秦维廉先生发表香港彩陶碳十四年代新资料。

这次一共邀请了六十余名来自国内、越南、日本及美国学者代表出席会议。会议在1994年春节后的2月25至28日举行。饶公是大会的主席，参会学者提供牙璋论文，经过他的过目（图二一）。饶公作《由牙璋分布论古史地域扩张》<sup>⑦</sup>（下文《牙璋分布》）的开幕演讲，并在会议前提交《由牙璋略论汉土传入越南的遗物》（下文《入越遗物》）。饶公这两篇文章对日后牙璋研究，有着指导性的意义。《牙璋分布》是饶公把中越牙璋置于近代古史重建的背景反思，《入越遗物》是饶公长期以来对越南古代历史研究，由文献提升考古角度的考察。其后饶公为李学勤先生写《比较考古学随笔》<sup>⑧</sup>书序、1997年香港回归在京发表《香港考古话由来》<sup>⑨</sup>，一再强调牙璋发现的重要意义。

人  
物  
图  
像



图一八 1992年11月4日饶宗颐在越南河内国家博物馆考察



图一九 1992年12月4日邓聪、饶宗颐、何文璠在越南考古学院内





图二〇 1994年2月饶宗颐与国内学者，陶正刚、张长寿、饶、杨泓（左而右）

饶公说过去香港人对历史的短视，源不深而流不远。香港本土，并不是明清及近代香港所能涵盖，香港有7000年与祖国连绵不断的历史承传。饶公告诫我们：“毋忘香港的根”（图二二）。

## 六、耄耋忆述《古史辨》曲终

1994年饶公从中越牙璋分布，反思三代历史形成过程的探索。在28年后的今天，仔细琢磨，当日饶公发言的学术思想，珠玉杂陈，胜义纷呈。

《牙璋分布》的重点有三：第一、会议由来及意义；第二、牙璋分布与商文化范围；第三、牙璋与古史地理空间分析。第一点，饶公从1992法国远东学院90周年院庆河内会议，首席发言香港牙璋新发现及国内情况，得到越南学界积极的回应，加上日、美等学者支持结集出版专著。他指出，“这次会议……把牙璋作为独立研究是古器物学的一桩大事考古学家与古史学家手热烈参加，踊跃提供论文共52篇，可说是香港学术界史无前例的一次会议。”在饶公巨眼中，从古器物学玉器以玉璋专题探索，开一时代新风气。香港人文科学研究中，过去以考古与古史的结合对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深入研究，是过去并不多见的。

事实上，香港大学在1961年由林仰山（Frederick S. Drake）教授为香港大学五十周年校庆，举办以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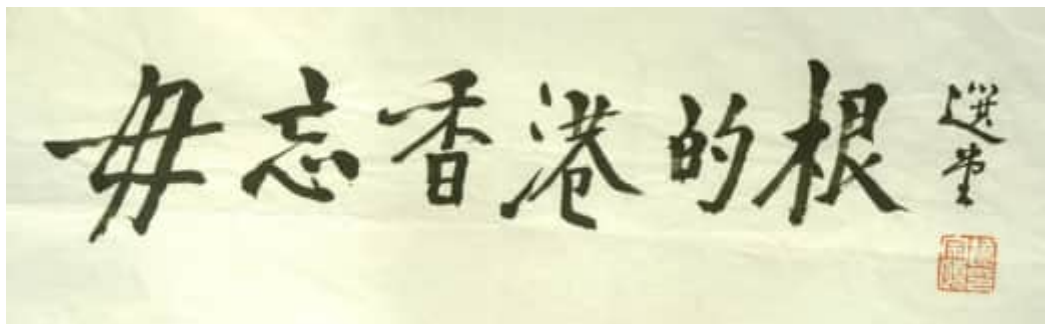


图二一 1994年2月饶宗颐主持牙璋及彩陶研究的会议，邓聪报告会议筹备工作。饶左侧陈方正，右侧金耀基

考古、语言与南中国相关研讨会，在1967年出版专集。1982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由郑德坤教授举办“夏文化研讨会”，一时之盛。饶公与此两次会议的关系密切。饶公对牙璋会议评价为“香港学术界史无前例的一次会议”，是否不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的陈志达先生，以旁观角色在《考古》发表相关书评，指出“（会议）中心议题是香港大湾遗址出土的牙璋……从而将中国古牙璋和南方考古研究引向更深的层次”。“香港国际性会议对中国大陆、香港地区和越南出土的玉石牙璋作为重点议题，客观上将玉研究引向更深、更专题化方向，其学术意义是深远的。”看来，饶、陈的看法，不谋而合。

饶公《牙璋分布》主旨论牙璋分布、发展序列及相互关系。饶公得家乡馈赠揭阳仙桥石牙璋，收藏在香港大学饶宗颐博物馆。饶公文中引用仙桥石牙璋，为会议公布《中国越南牙璋遗址分布》增多一处牙璋出土的遗址。对牙璋发展序列，饶公指出：由山东龙山文化临沂大范庄、海阳司马台最早，其次是神木石峁，再次是二里头。然后由二里岗文化传播，西向远及西南地区四川广汉三星堆，又从湖北、湖南、福建以至广东及香港。

《入越遗物》一文中，饶公对越南牙璋的点评。I类牙璋：似龙山期牙璋，“有阑而齿状较弱，形似圭而



图二二 饶宗颐教授翰墨“毋忘香港的根”

刃微凹。”Ⅱ类牙璋：精制牙璋属于早商的阶段，“两处有阑，其间有锯齿五排，阑上一处有若干阴线弦纹……”第Ⅱ类牙璋“与二里头、郑州及三星堆是一脉相承。”对越南早商时代的牙璋，究竟是当地制作，抑从华夏传入的礼器？饶公认为难遽下结论。他说“我认为殷人的势力已远及东南亚群岛。”

I类牙璋的分类，目前我们认为仍保留若干龙山牙璋的风格，陕西汉水东龙山、河南花地咀、二里头ⅢKM6曾发现。Ⅱ类牙璋如郑州杨庄及望京楼、三星堆月亮湾早年出土牙璋。饶公认定越南Ⅱ类牙璋所属，牵涉月亮湾牙璋年代的判断，可能上溯早商二里岗文化阶段。杨庄及望京楼牙璋是采集品，被判断是早商阶段。

近年据我们对武汉盘龙城遗址出土商代早期大型玉戈的观察，不少玉戈由他器所改制，一些玉戈扉牙仍遗留有牙璋玉器的遗风。笔者2021—2022年在长江流域以至闽北实地考察，从四川月亮湾、湖北黄陂，东至闽北光泽走马岭，即长江以至闽北一线，均可见早商牙璋等商代玉器的扩散。2015年，我们与成都金沙博物馆编著《金沙玉工I》<sup>⑧</sup>，书中把望京楼、月亮湾及越南XomRen相关牙璋形制对比，龙形扉牙复杂的分析，如出一辙，结论指出三地相关的牙璋，可能由同一玉工团体数世代承传制作，各地牙璋的制度及人事关系紧凑，牙璋由中原向南至越南红河流域，距离上数以千公里南下进展所需时间，可能仅以百年间时序即可跨越。估计此期间牙璋在广域的空间移动，涵盖国家政治活动扩张的背景。饶公的巨眼对越南牙璋早商年代的判断，启发了中越早期青铜时代交流的探索。

有关牙璋分布问题，饶公总结：“由牙璋发现地点观察，东濒黄海，南至交州，及闽、粤海隅，都有牙璋传播的足迹。”他引用了《淮南子·泰族训》“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后幽都”，论证商人疆土与牙璋分布所见，完全符合事实。饶公所指商人疆土，当然不是领土国家的概念。然而，牙璋在二里头文化作为国家宫廷礼仪的重器，其后在四川的三星堆、金沙大量发现，显示玉牙璋在王权与宫廷礼仪层次独特的角色，商代玉石牙璋主要的功能与政治密切的关系，决非空穴来风。

最后，由牙璋分布及时代的判断，不意让饶公勾起弱冠之际回忆，受近代史学家顾颉刚赏识，被邀参与编辑《古史辨》的往事。众所周知，民国以来疑古思潮，由顾颉刚引发古史辨运动，一度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核心，而《古史辨》系列出版，更是古史辨运动的标志。1929年顾颉刚到北京燕京大学任教，教授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程，专注《尚书》《禹贡》等研

究，牵涉古书历史地理等复杂的问题。1937年前后，顾颉刚委托饶公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建构古史层累造成的过程。他指导饶公以此观点，着手编辑《古史辨》第八册的工作。其后，饶公所拟定第八册《古史辨》目录，在1940年《齐鲁大学》的《责善》1卷3期已披露。可是后来饶公一直拖延编辑工作，虽多次被催促出版，始终未见付梓。《古史辨》作为近代史学思潮重要著作，如何第八册却在饶公的手中，竟失去踪影？民国初年，对史学深远影响古史辨运动的系列著作，为何无疾而终，确是近代史学史令人费解的谜团。

解铃还需系铃人，一直到半世纪以后饶公在古稀之年，在1994年《牙璋分布》一文披露心中顾、饶间纠结，并且对顾的古史辨的思想，提出严厉的批判。其后在耄耋之年，饶公按《牙璋分布》部份文字内容，再拓展为《论古史的重建》的论文，收录在自己《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第一卷《史溯》的序章，意义非比寻常。而《古史辨》第八册难产的真相，才由此大白于天下。按饶公自己解释，顾与饶的学术思想在古史辨运动后期，出现严重的分歧。这段学术史细节，还是以饶公语言表达，最为生动准确。

饶公在《论古史的重建》中指出：

“记起我在弱冠前后，……那时候，我深受顾先生的影响，发奋潜心，研究古史上的地理问题。曾经把古书上所有与地名有关的记载抄录若干册。……我对顾老的‘古史中的地域扩张论点’，已有不同的看法。那些依据地名迁徙，作出推论，滥用同音假借来比附音义相近的地名，建立自己一套想象所考虑到的‘地名层累’，……许多古史地名都给予重新搬家。于是西周建国改为由秦迁晋，楚的洞庭、沅，湘不在湖南而移至湖北。这些论点从表面看来，似是言之成理，但经不起推敲。我认为关于把古史地域的尽量缩小，同名的古史地名可作任意易位，这是不牢固的推理方法，这样的连篇累牍的讨论是没有意思的。在我屡次比勘之下，觉得无法接受，只有失望。所以我决定放弃第8册的重编工作，原因即在此。遂使《古史辨》仅留下只有七册，而没有第八册，这是我的罪过。顾先生把我带进古史研究的领域，还让我参加《古史辨》的编辑一工作，我结果却交了白卷。”<sup>⑨</sup>

耄耋之年的饶公，仍对《古史辨》在自己手中停刊的历史责任，似有抱罪怀瑕自省。饶公表述内心世界，由于在研究古史地名过程，自觉“我的古史观有重大的改变”，“但真理在前面，我是不敢回避的”，是一种壮士断臂，不得不忍痛割舍的体验。1994年饶公在香港中文大学国际牙璋会议揭幕辞，批评“顾先生过去的狭隘观念，应该重新检讨”。语气十分沉重。对此，我们看作是语重心长、苦口婆心，而非不敬的表达。所

以，事后饶公补充说自己“仍是循着顾先生的途辙，是顾先生的继承者”。饶公据牙璋发现，回顾自己半世纪对古代史研究的感受，很值得我们深思。

中国近代五四运动后史学发展，从1920年初胡适、顾颉刚引发古书辨伪风潮，展开集中攻击伪书的运动。胡适主张“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为当时推动古史辨发展的动力，“先疑后信”，一时成为治古史的信念。顾颉刚对古书的辨伪精神，毫无疑问是代表20世纪初中国史学重要的角色。当时我们的老师饶宗颐、郑德坤教授等，深受影响。饶公在深入研究古史地理问题后，已彻底弃盲目追随古史“层累观”的束缚。从1923年起，顾颉刚与钱玄同催产古史辨运动推向高潮的发展，到1940年后饶公从古地理研究，指出古史地理层累说种种不合理的破绽，反映民国初年古史研究思潮迅速发展，如惊涛骇浪的起伏。在古史辨运动发展高潮，饶公仍然保持独立思考，敏锐触角，由起初引为同道，后因了解而分手，最终以《古史辨》第八册流产，戛然而止为终曲，可视近代史学史日进月步的表现，何罪之有！然而古史重建的问题，很明显不可能单靠古书辨伪所能成就。古史辨学派一直对田野考古重建历史，寄以厚望。

上述这段《古史辨》历史终曲因缘，一直到香港大湾牙璋发现后，由于对牙璋分布的重新认识，值此引起饶公对《古史辨》旧事重提，岂非百年中国史学发展的侧影。最后，饶公呼吁“不必再留恋那种动辄‘怀疑’的幼稚成见”，“避免使用某一套外来的不切实际的理论去堆砌主观架构”，谆谆告诫。我仍希望以下引饶公对古史研究期待，以为谨记。“须知，地下层出不穷，浪翻鲸制似地出现古物，正要求我们须更审慎地、冷静地去借重它们以比勘古书上种种纪录，归纳出符合古书记载原意的合理解释，而寻绎出有规律的历史条理。”<sup>⑩</sup>

## 七、不知古焉知今好古敏求

饶公学识渊博，要概括评价其成就，谈何容易！钱仲联先生尝谓“此并世之容甫与观堂也。……今选堂先生之文，既有观堂、寒柳融贯欧亚之长，而其精通梵文，亲历天竺，以深究学佛，则非二家之所能及，……至其散体，所考释者，自卜辞、儒经、碑版以迄敦煌写本；所论说者，自格物、奇字、古籍、史乘、方志、文论、词学、笺注、版本，旁及篆刻，书法、绘画、乐舞、琴技、南诏语、蒙古语、波斯语，沉沉伙伙，新解澜翻，兼学术美文之长，通中华古学与西裔新学之邮。返视观堂、寒柳以上诸家，譬如积薪，后来居上。九州百世咸以观之，得不谓非东洲鸿儒也哉”<sup>⑪</sup>，所论甚为确切。众所周知，先生家学渊源，父亲饶锷“天啸楼”藏书数万卷，自少泡

浸传统经、史、子、集，熟悉目录学，汲取清季乾嘉治学精萃。饶公自述选堂的取意，一生学术变化：“平生治学，所好迭异。幼嗜文学，寝馈萧《选》，以此书讲授上庠历三十年。中岁重理绘事，以元人为依据，尤喜钱选。六十退休后，莅临法京，以上代宗教与西方学者上下其论。”从饶公治学三变，似乎看不到与考古关系。考古学也非饶公家学的承传。

在香港人文科学领域中，对考古学如此重视的学者，饶公是极少数的代表。近代欧美汉学，厚今薄古的倾向明显。英国殖民管治时期的香港，考古学术更无发展基础可言。然而，近代中国传统学术发展，饶公寄与考古厚望。《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共二十册，第一卷《史溯》，开卷第一页，第一句谓：“20世纪为中国学术史之飞跃时代，亦为反哺时代。飞跃者，谓地下出土文物之富及纸上与田野调查史料之大量增加。由于考古学之推进，可征信而无文献之历史年代，已可增至七八千年之久。反哺者，谓经典旧书古写本之重籀，奇字奥旨，新义纷披，开前古未有之局。”人文科学中考古的重要角色，饶公有深刻认识。我们都知道考古学本身，有很强烈自身学科的特色。学术界公认饶公在考古学特别甲骨文、帛书、玉器、青铜器及陶文等研究，成绩斐然。我过去和饶公谈论考古机会不少，但从没有想过要追问饶公考古倾向的来源！1940年代饶公年正是玉树临风岁月，在家乡韩江考古工作，肯定对他一生的治学，产生重大的影响。饶公考古经历如何锻炼成才？

1938年陈公哲是第一个在香港各地考古收获丰硕的学者。从《陈公哲先生知行录》，载饶公初期到香港与友人两张的合照。按照片中人居港口期，估计是在1950/51年间拍摄的。饶公是1949年9月抵步香港。第一张照片右而左郑德坤、陈公哲、卫聚贤、饶宗颐，茶叙于华翠阁（图二三）。从四人的碰头，考古肯定是



图二三 1950/51年饶宗颐、卫聚贤、陈公哲、郑德坤（左而右）在香港聚会

核心的话题。这是香港有史以来，早期华人考古最鼎盛的聚会。宕开一笔，郑在1952年离港去英伦剑桥大学，教授中国考古学，开西方最早中国考古学系统研究风气。卫聚贤是清华大学国学院王国维的学生，有《中国考古学史》等名著，著作宏丰。后1975年卫赴台湾。据好友郑炜明博士教示，饶、卫到港初期，一同暂住香港潮州会馆。陈公哲上海出生，为精武核心人物，曾就读复旦大学，多才多艺。1936年陈抵港后，对考古发生强烈兴趣。1938年陈自资在香港田野考古，发现东湾遗址商代墓葬群。陈的《香港考古发掘》<sup>①</sup>报告1957年《考古学报》发表，为华人在港考古第一人。1961年陈在港离世。陈、卫战后与香港考古关系较少。饶公从1949年起，除欧美日访问研究教学外游岁月，终其一生居住香港。上述这张难得照片，反映饶公来港不久，好古者同声相应，同气相求。70多年后今天，再翻出这张四巨头茶叙发黄旧照片回味，感慨无量。另一张照片是饶公与麦兆良神父 (Maglioni Raffaello) 及陈公哲的合照，照片顺序为韩江考古学家、海陆丰考古学家、香港考古学家 (图二四)。麦兆良是意大利神父，1934年起在海丰传教及考古，对粤东考古贡献甚大。上述照片反映饶公到香港初年，热心考古，为韩江考古的代言人。

1951年1月饶公在香港完成《海南岛之石器》一文，内容记载他在香港1950年的考古活动。是年9月



图二四 饶宗颐、麦兆良、陈公哲在香港聚会

韩槐准自海南来港，向饶公出示从海南文昌凤鸣村采集各种石器。饶公看到这些石器十分兴奋，“摩挲竟日”，并马上邀请郑德坤“为之鉴定”。饶公迅将石器资料测量整理，摄制图像五幅。三个月后，饶公就完成《海南岛之石器》文字稿工作，效率甚高。我们知道郑德坤在华西大学任教期间，已与饶公相知，交流韩江石器的研究。1974年郑德坤从剑桥大学退休返港。1978年在中国文化研究所创立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1985年我回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工作，其时饶公在中国文化研究所任荣誉讲座教授。郑当上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郑、饶在港分别三十多年后，谁料竟又聚首同一研究所工作。当时，北山堂主人利荣森先生为研究所常客，穿插我这个晚辈于其间。郑、饶之间起初交流，韩江及海南的石器起了媒介的作用。我这个学生以侍奉石器为人生目的，说石器在郑、饶、邓间的缘分，不正是石头记故事吗！1950年12月8日，饶公在香港中英学会演讲，题目是“广东最近发现新石器”，当时海南岛为广东省管辖，会中饶公展示海南岛最近出土石器的照片。1955年李郑屋砖屋汉墓及大庙湾南宋咸淳十年严益彰石刻相继发现，为饶公大展身手的天赐良机。总之，饶公从一开始定居香港，就与考古关系密切。饶公考古形象得以逐步树立。饶公初期考古开展是自学成才的吗？

从现在所能看到资料来说，饶公在考古方面确是无师自通。我们从他的纪录中，很难找到哪一两位人物，能说得上是饶公考古学直接的老师。在饶公学习考古学起步开始，得益于众多国际友人包括英美日本及国内考古专家的襄助。“转益多师是我师”，以饶公才华及虚心请教的治学方式，不难成为考古一族的表表者。1950年在香港出版《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以下《韩江》）单行本出版，为广东第一部史前考古专刊，标志饶公阔步跨入考古的门槛。

从《韩江》前言所见，20世纪30年代香港外国学者在南丫岛、大屿山的考古工作，对饶公追求考古起远距离的启蒙作用；粤东海丰考古丰富的发现，对饶公是近距离的冲击；隔海相望的台湾考古成果，提供饶公跨海文化交流对比的构思。按《韩江》一书，香港芬神父 (Father Daniel Finn)、施戈斐侣 (Walter Schofield) 在大湾及东湾成果，麦兆良在海丰采获，都显示韩江流域与粤东间考古文化关系密切，有很大研究发展潜在的空间。香港考古在1934年后，特别芬神父逐年不断考古新发现及大量研究成果的公布，带动了东南沿岸考古工作的蠢蠢欲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从《韩江》推测，饶公可能是在1941年起，开展韩江流域的考古工作。随香港考古起舞后仅数年间，触觉敏锐的饶公，智珠在握，见贤思齐，主动学习考古从事古史的开

拓。这启迪饶公一生学术视野及目标，有着重大的意义，从家学传统国学文献纸上学问基础，不自觉地导向地下世界物质文化的探索。

《韩江》中饶公重视考古科际结合，两广地质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均见参与，地质学家陈恺为石器石质鉴定。郑德坤对《韩江》报告书作全体校阅。郑在1937—1941在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得博士学位。饶公为了学术上追求，更专程跨海前往台湾，拜访了台湾大学的日本考古学者金关丈夫及国分直一教授，请教及对比韩江与台湾史前文化的风格。金关丈夫是京都大学考古学家滨田耕作及体质人类学家清野谦次的得意门生。金关也是日本著名体质人类学者。国分直一出生于东京，而成长于台湾的考古、民俗及民族学者。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宋文薰及刘斌雄先生都是国分的学生。国分在战后初期仍是台湾考古指导者，培育人才，贡献台南考古良多（黄川田修2022教示）。

国分写过一篇《饶宗颐与潮州民族学先史学》短篇，记述1948年饶公访问台湾大学的活动。当时饶公身份是南华学院教授兼文史系主任、广东省文献委员会委员、潮州志委员会副主任。国分展示台湾史前文物，并提供饶公若干台湾史前陶片对比。饶公展示其未刊稿《潮州史前遗址之考古发现》，双方就华南及台湾史前文化交流充分融洽。国分眼中留下饶公的印象是“温厚诚实”。饶公离台后，曾一次寄信往国分道谢，且附送中山大学文学院《文学》第二期刊物。我和国分先生在多年前出席日本考古学会年会间，有一面之雅。因先生曾发表东南亚史前树皮布综合研究，亦有一度书信往来。当时无知国分与饶公一段学术直接交流往事！否则，可以从国分先生口中，更多了解饶公当日访台的故事。

《韩江》中记载1948年4月5日饶公在调查黄岐山遗址，从山坳堆积土层断面，发现石镞。又在地表采集到斧、锛石器及陶器。6月16日饶公往崇光岩虎头岭采集石器，均是饶公田野调查活动的纪录。《韩江》中饶公指出揭阳、兴宁出土巨大的石戈石锛。现今我们都知道，这些石戈等遗物属于长滨文化文物，代表青铜时代商文化扩散的踪迹。饶公说这些文物被收藏于北京历史博物馆，或许我们从北京可以找到当年饶公指示过的文物。季羨林总结饶公考古成就，包括八项之多：1)古陶；2)甲骨、金文（鼎彝）；3)铁器、丝绸；4)秦汉残简；5)出土写本（缙书、帛书等）；6)碑铭；7)敦煌卷子；8)吐鲁番文书。《韩江》是饶公考古学的敲门砖，开启饶公通往无尽史前及文物研究通道，为极其广阔人类史的世界。饶公自身具备传统文化尤其小学深厚的基础，才可能有考古学光辉成就，就不待余言为轻重。

饶公晚年对考古学的重视，与日俱增。2001年11月2日是北京大学百年纪念日子，饶公被推荐作纪念大会演讲的代表，主题是《新经学的提出——预期的文艺复兴工作》。饶公演讲劈头第一段，就讲考古三代工程及郭店楚简的意义，高举考古学在人文科学中的重要性。

饶公原话是：

“我们不要辜负地下的宝物和考古学家的恩惠。……考古工作对人文主义发挥出决定性的作用，古文明研究的扩大，使人们对整个世界有崭新的认识，添加了进一步对历史文化的洞察力。反观吾国近半世纪以来地下出土文物丰富的总和，比较西方文艺复兴以来考古所得的成绩，可相匹敌。令人感觉到有另外一个地下的中国——一个历史古文化充满新鲜感、富有刺激性的古国。”

2001年北大百年纪念会，我亦被邀幸陪末座，见证饶公历史性的演讲。作为一个考古学徒，更感我国古文化复兴大时代兴奋，手铲天书的体悟，任重而道远。我特别喜欢饶公所说“地下的中国”的警句，含义深刻。日后回港，我向饶公求墨宝，指定动作写“地下的中国”，老师慷慨挥毫，一米多长楮纸大字饶公翰墨从天而降，一直装裱在我香港中文大学的书房内，惹人羡慕。此金玉之言作为北大百岁的见证，无价之宝。

## 八、化作春泥更护花

31岁饶公（1948年）从广东跨海访问光复后时期台湾，拜会素未谋面台湾大学著名考古学者金关丈夫、国分直一（留用学者），目的是为完善韩江考古隔海对比探索，充分反映年轻时期的饶公，热衷国际间学术交流，不辞辛劳，求学必须亲历其境，强烈学问追求意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学者近乎梦幻的理想。作家曾子墨生动描述饶公在香港令人羡慕的学历：“文革中大陆的学者们停滞不前，饶宗颐正在满世界留下脚印。要考证甲骨文，他就出现在日本。想要研究敦煌学，他便去了法国。要研究梵文，他就去印度。”1949年后饶公在香港，得以多次赴欧洲、印度、美国、日本各地游学，自称“无家可归的游子”，造就世界性学术视野的饶公，也成就了饶公世界性学术的贡献。法国学者称“饶公不仅是法国汉学界的老师，而且是全欧洲汉学界的老师”，这是很有份量的评价。而饶公直言：“香港造就了我。”他深信香港是福地。饶公非常热爱香港这来之不易的宝地。他不喜欢别人批评香港是文化沙漠，也不满意称他是香港文化沙漠中的一枝独秀。余秋雨说：“香港能出一个饶宗颐，那香港不是文化沙漠了。”这些话反惹得饶公有点生气。他说把香港说成文化沙漠，是“挖苦香港”。“香港没有文化哪里有今天的香港，

这么灿烂的香港。”

饶公更不喜欢英国殖民管治时期以来讲的香港故事。他批评“有人说香港原来只是一个小渔村，是不符合事实的”。他公开说香港社会最大问题，是对历史的“短视、无知”！他指出明《粤大记》书上海图出现“香港”的名字。而元代东莞白木香价值和白银相等，莞香每年输出贸易额值银锭数万两以上，“香港在前代是港市贸易的港口”。他认为从考古学上分析，香港在三代期间，已经与中原地区文化有密切的交往。为迎接庆祝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饶公在北京国家文物局所主办的《中国文物报》，发表《香港考古话由来》。这是饶公对香港古史的综合回顾。他仍然强调南丫岛大湾商代牙璋的重要意义，很值得我们一再玩味。

“大湾牙璋的出土为香港考古一大事。一九九二年法国远东学院重获返河内举办九十周年学术会议。院长汪德迈君要我参加，作第一个学术报告，我趁机谈到中国香港出土牙璋和越南的牙璋应该有某种关系，由邓聪提供实物的图片和资料，由此取得越南考古界的合作，得于前年在香港举行大型有关全国的牙璋讨论会，引出全面性的研究，了解这一器物广泛的分布，远及南中国海边裔地区，打破以往封闭状态下视为各自割据的独立文化的误解，意义非常重大。神木、三星堆的牙璋发轫于夏殷之世渊源殊远，具见汉文化在周、秦以前与南海、交趾已有密切之交往为不可否认的事实。”<sup>⑩</sup>

饶公指出香港大湾牙璋玉器的渊藪深远，金玉良言。魏征《谏太宗十思疏》：“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臣虽下愚，知其不可。”香港社会的“短视、无知”，是殖民地管治政策教育体系的问题，社会上普遍厚今薄古，反映在“香港原来只是一个小渔村”的意识，一句对香港传统文化错误的定位，值得我们反思。1997年《香港考古话由来》是饶公对香港古史最后一篇文章，蕴含着他对香港血浓于水爱意，殷切期待香港源远流长历史的继承，发扬光大。

2018年2月6日饶公于家中睡梦安然仙逝。饶公生前自谓1981年游太原，夜梦有人相告。后即在大同华严寺睹龙藏本经，见卷首序题“元丰四年三月十二日真定府十方洪济禅院住持侍法慈觉大师宗颐述”，后在《宋史·艺文志》找到释宗颐着《劝孝文》，经考证为同一人。回来后饶公刻印章“十方真定是前身”，今生前世的记忆。先生往生西方，得生净土。2007年利荣森先生他界。利、饶二公感情深厚。利公丧礼我见饶公撰写挽联，“吴楚共登临南国搜奇恍一梦，生真露电北山汲古足千秋。”利、饶联袂同游，好古敏

求。这是利公人生，何尝不是饶公平生。利公搜奇奉献祖国文物，收藏化私为公；饶公寰宇弘扬国学，汲古足千秋，诚哉斯言！

饶公喜自谓：万古不磨志，中流自在心。不磨志在不朽追求，自在心求独立精神。我特别喜欢“万古”的意境，只有从历史时代的深度解读，才能可见到人类历史本质。从博士课程开始，我对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尤其倾心，很意外饶公对数万年以至人类的起源的话题，都特别感兴趣。一次在中大中国文化研究所午后闲谈中，饶公讲述1979年秋他在法国南部拉斯科（Lascaux）洞穴壁画的惊人发现（图二五）。他说洞穴内很多体型较短脚马。他认为是东方的蒙古马去了西欧，对这个发现他十分兴奋。我特别羡慕饶公曾入拉斯科洞穴参观。因为我1983年暑假有几个月在法国南部Sorde-l'Abbaye Landes的Abri Dufaure岩荫遗址，参加发掘马格德林文化。当时，我也曾发愿希望去拉斯科洞穴参观。后来才知道是不可能的，入洞最少一年前申请。之后我去了西班牙北部参观著名阿尔塔米拉洞穴（Altamira），但也是只能在洞外观望，最后在复制原大的洞穴内，仰卧地上观察崖顶野牛、马的旧石器时代绘画。在这样经历背景，我当然更能理解饶公曾入拉斯科的激动心情。

最近，我才从饶公《选堂赋存》<sup>⑪</sup>，发现了他的《法国猎士谷（Lascaux）史前洞窟壁画颂——并序》。序言中描述洞内所见各种动物的奇观，尤其以中国马四十五匹，为点睛之笔，如此阵容庞大兽猎，堪比古代天子上林羽猎景象。“睹其壁间藻绘，群动驰骛于其上，兽之数一千五百有奇，牡、牝牛、牡鹿、山羊、马、暨中国马（共四十五匹）与独角兽类麒麟者（Livorno二只）皆具。穷山尽野，囊括雌雄，信畋游之巨视。上林羽猎，逊其奇矣。”虽然饶公只有一个小时观察拉斯科壁画的机会，却仍被洞窟壁画各种动物组合气势磅礴，线条粗犷生动逼真所震撼。这些壁画年代



图二五 饶宗颐与邓聪在中国文化研究所饶公书室

碳14测年为15000年前杰作。饶公以现世艺术最高水准的眼光,比较“万古”以前猎士无声诗歌,慨叹“后安胜前,甘拜下风”。“乃悟今人之艺事,远不逮于皇古。”饶公猎士谷《颂》,是他一生文章内容涉猎文化年代最早的一篇,“振古莫俦,亿载朝宗。”考古溯源的痛快,用饶公原话,“追溯源头,给人非常透彻的感觉。因流溯源,由源而及流,钩沉探赜,原始要终。”据此我们才可能了解,饶公批评香港文化问题四字真言,“短视、无知”,也是深爱香港的真情流露。树尤如此,人何以堪。

我有幸与饶公今世结下师生玉璋之缘。我的前生,也可能是一个石匠,或者是玉工。《礼记·聘义》引孔子语,“圭璋特达,德也。”牙璋是璋的一种,璋是高尚品德的表征,又是国家政治礼仪权力和身份的象征。广域牙璋的出土,可能代表在商代期间,各地接受共同政治理念倾向的萌芽。《由牙璋分布论古史地域扩张》<sup>⑨</sup>是饶公对香港文化重笔浓墨的献礼。饶公以春风风人,值春风吹拂玉璋,传达他对心目中香港福地,绵绵无尽的温情与爱意。云想衣裳花想容,饶公音容宛在。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谨以拙文追怀学生时代以来,老师谆谆教诲,如沐春风,学恩如海,学生愿为香港考古略尽绵力。

(2022/6/22, 初稿于美国奥兰特, 定稿乌溪沙星连海)

#### 注 释:

①邓聪:《秦汉香港及李郑屋东汉官吏墓论述》,见王国华主编:《香港文化发展史》,中华书局,2014年。

②饶宗颐:《由砖文谈东汉三国的“番禺”》,见郑炜明整理:《李郑屋古墓》,香港历史博物馆,2005年。

③饶宗颐:《九龙与宋季史料》,香港万有图书公司,1959年。

④邓聪:《香港考古之旅》,香港区域市政局,1991年。

⑤邓聪、区家发:《环珠江口史前文物图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1年。

⑥李学勤:《论香港大湾新出牙璋及有关问题》,《南方文物》1992年第1期。

⑦⑧饶宗颐:《由牙璋分布论古史地域扩张问题——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国际研讨会开幕演讲》,《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1期。

⑨李学勤:《比较考古学随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⑩⑪饶宗颐:《香港考古话由来》,《中国文物报》1997年6月22日,亦见《选堂集林·史学卷》,山东画报出版社,2019年。

⑫王毅、邓聪:《金沙玉工I——金沙遗址出土玉石璋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

⑬饶宗颐:《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⑭⑮饶宗颐:《论古史的重建》,见《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一(史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⑯钱仲联序,饶宗颐著:《选堂文集》,首发于1991年,可见《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十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⑰李晋光:《陈公哲先生知行录》,香港静庐出版社,1951年。

⑱卫聚贤:《中国考古学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

⑲陈公哲:《香港考古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4期。

⑳饶宗颐:《海南岛之石器》,国泰印刷所,1951年1月稿。

㉑饶宗颐:《选堂赋存》,《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十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责任编辑:王雁君)